

●茅振芳

## 关于书次号几个问题的认识

在图书情报工作中，给书次号是件不起眼的小事，但多年来却一直困扰着人们，并在中国图书馆界一再成为议论的热点，掀起过几次讨论热潮。有关文章在专业期刊上也时有所见。尤其是浙江和河南两省先后建立了课题组，探讨“同类书排列的标准化”问题。全国性的专题研讨会也开了两次，并在该两省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书次号国家标准起草小组，汇集了诸多名人专家，搞出了一个《中文同类书排列规则——汉语著者号码表》，作为国家标准送审稿。成绩不可谓不大，然而，人们似乎对书次号标准化的前途并不乐观。为何区区一个书次号问题，竟长期解决不了呢？窃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有理论认识问题，有技术问题，有习惯、心理问题，恐怕也有“门户”问题。笔者想在本文中就对书次号的认识问题谈点看法。

### 一、书次号的功能

在类分图书时，用一种符号系统区分和排列一组同类书，这种符号就叫书次号。它的作用就是在类分图书的基础上，依据某种标准对图书进行再区分，同时确定这一组书的先后次序<sup>(1)</sup>。可见书次号的功能就是区分一组同类图书的先后次序。有人说，书次号还能“深化”图书分类。诚然，书次号可以对同著者号的不同著者、同著者的不同著作、同著作的不同版本以及同著作的不同译注本等作进一步区分，但是，这种进一步的区分，充其量只不过是对同类号下的一组图书，按不同情况作形式上的，而不是内容上的区分，而且这同按图书分类的次要标准——图书的形式特征归类还不一样，按图书的形式特征归类是区分图书的类别，而书次号区

分的是同类别下一组图书的排列次序，所以书次号不能、也不可能具有“图书分类的深化”功能。吾师李严说得好，“我们称书次号是图书分类的深化和延续，只是就同类图书个别化这一点来说的，和图书分类的深化和延续不是同一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图书分类的深化和延续是指在归类时，类目上的上下位类关系，从而反映了学科体系的从属关系，而书次号和分类号不是这种关系。书次号只是对分类号起辅助区分作用，以确定同类书的排列次序。书次号依附于分类号，离开了分类号，书次号就毫无意义<sup>(2)</sup>。另外，这种进一步的区分作用，是书次号在履行其同类书区分功能时，附带产生的作用，不是书次号本身的功能。本身的功能和由功能附带产生的作用之间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不能混同。所以，将书次号的这种特定的区分作用，认同是书次号的功能和属性而作为评比鉴定书次号的科学性的一个内容是不妥当的。有的同志主张用著者号码表组织著者目录，也就是说要求著者号码表具有著者目录组织法的功能。这当然是出于好心，但太理想化了，恐怕难以实现。试想：第1，著者号码表是利用图书著者这一因素来区分一组同类书的先后次序的，而且是首先要根据书的内容确定分类号后，才用到著者号码表。它紧紧依附于分类号，并受分类号限定，离开分类号它就无所作为，这是著者号码表的最根本的特点。号码表区分的是同类号下一组图书的排列次序，是应用某种检字法编制的索取图书的号码体系；而著者目录组织法是用来排检著者目录的，是应用某种检字法本身的排检规则。虽然后者也是依据图书著者这个因素区分排检次序的，但它不受图书内容所决定的分类号的制约，与分类号毫无关系，它区分的是馆藏图

书著者的次序，而不是同类书的次序。第2，同一著者的著作，不一定全部归入同一类里，在不同类里，同一著者用同一号码表取的著者号，不一定是绝对相同的，故同一著者在同一图书馆藏书体系中，或者说在同一分类体系中，或者说在同一分类目录体系中，其号码可能会有几个。而在著者目录中同一著者必须集中，不只是著者本人的多种著作要集中在该著者名下，连该著者的传记、研究、评论等凡涉及该著者的著作也都必须集中在该著者名下，不允许散见多处。只此二端，可见书次号（其具体形式著者号码表）与著者目录组织法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它们的功能不同，性质不同，所起作用也不同，因此不能一身二任，也不能互换角色。

## 二、重号率问题

研究书次号理论也好，编制书次号（本文所称书次号主要是指著者号码表）也好，都十分重视重号率问题。“区分性能好，重号率低”，已被公认为编制和评价书次号的标准。但不能强调得太过份。如果为了达到这一要求而煞费苦心，左一条规则，右一条规则，用了种种复杂的符号，人家看都看不明白，何云使用。其实，不产生重号的书次号是不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尽可能地减少它，并且当出现重号时又有简便的方法来加以区别。笔者认为，可以把“适度不便”的原则引入书次号的研究和编制中，允许有适度的重号。或许有人会说：“种次号不会有重号。”如果是原始含义上的种次号，应该说不会有重号。然而，在实际使用种次号的过程中，为了解决使用种次号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规定一些“专用号”，如“著者专用号。”有了这些“专用号”就必然会产生重号，问题是尽量使其减少。因而，对重号问题，过与不及都不可取，还是承认适度重号为宜。切不要自己给自己划地为牢，作茧自缚。另外在考虑号码表的“区分性能好，重号率低”的时候，要充分注意“最小努力原则”。从实践来看，以《中图法》为例，出现重号机会较多的只有极少数的类，且大多出现在文艺作品类中，如I247.5等。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不妨有针对性地给这样的类规定一种特定的取号法，不必一个号码表一贯到底。在设计取号方法时还可以根据少数类的特殊现象“因

类而异”，这样可以不因处理个别特殊情况而使整个表变得过分复杂，使号码表有更强的适应性，既能减少重号，技术上又不复杂，从而增强它的生命力。

## 三、可操作性

国内诸多专家在研究书次号时，对编制、评比和鉴定书次号（主要是著者号码表）提出了种种原则、要求和标准。如有的提出科学性和实用性两个标准<sup>(3)</sup>。当然我们可以规定书次号应有这性那性，但核心应是实用性，而实用性又决定于可操作性。可操作性体现在号码表的类型、体系、方法、符号系统等方面。问题往往出在片面追求“区分性能好，重号率低”，而采用复杂的区分技术和过多的符号系统，甚至采用“独创”的让人看不懂的符号系统和取号方法。其可操作性如何便可想而知了。

有的研究者和编制者，又太醉心于科学性，而偏偏忘记了使用者的承受力。我们研究书次号，编制号码表，是供人使用的，所以不能见表不见人，不但要研究书次号本身的问题，还要研究用户的心理。不仅要研究客体（用户）的心理，而且主体本身要有用户意识，要设身处地从用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来个“角色替换”。可以断言，无视用户心理，编出来的表是不会受欢迎的。故而，我们切不可脱离实际，脱离用户单纯抽象地谈“科学性”。什么是书次号的科学性？其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如果只有原则性的一句“科学性”，而说不出科学性的具体内容，在实践中必然会引起混乱。笔者认为，科学性就是规范化。不管是谁，不管有多少不同层次的人，在用同一个表取同一著者号时，都能取出同一个号，而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这就是科学性。科学性要同实用性联系起来考虑，实用性就是便于使用，便于操作。从形象上看要简明、直观、易查、易写、易认、易读。达到取号迅速准确，排除不确定性。为此，在号码形式的设计上，不要追求形式上的整齐划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根据实际需要号码可长可短，在原表基础上可缩可扩，如小数制的应用。再就是要考虑号码的多元性，即紧密结合分类法的特点，按类的需要和分类法的有关规

（下转第88页）

将筛选出的信息制成卡片，并对操作的各个方面都编制一张卡片载入因果鱼骨图内（见图中上部小圆）。至此，完成了第一个循环（1~3）。然后，再根据具体工作的发展需要，再集思、再选择、再记入，进入第二个循环（4~6）。依此类推，循环往复，整个图书馆工作的管理水平便呈螺旋式提高。

人们不论做任何事情，常常都是从已获得的知识或经验入手，按着深谙的程序或方法去办，轻车熟路，常可以事半功倍。这也许就是人们好因循守旧的缘故。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你因循守旧行不通时怎么办？CEDAC 图表正是在这方面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当轻车熟路走不通时，就另辟蹊径而求新。以上观点，从图 5 的卡片编制、更新程序及附加卡片式因果图本身固有的“附加”功能完全可以验证，而下面列出的 CEDAC 管理体系模式分析图（见图 6），则更形象生动地揭示了 CEDAC 图表的这一求新功能。

图中小圆 A 为知识、经验、程序、方法，管理者和群众共知共践内容；中圆  $B_1$ 、 $B_2$  部分，为各自已知未践内容； $C_1$ 、 $C_2$  部分，为共同已知未践内容；大圆  $D_1$ 、 $D_2$  部分，为各自未知未践内容； $E_1$ 、 $E_2$  部分，为共同未知未践内容。这样，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便形成了这样一种循环：共同已知已践  $\rightarrow$  各自己知未践  $\rightarrow$  共同已知未践  $\rightarrow$  各自未知未践  $\rightarrow$  共同未知未践  $\rightarrow$  共同已知已践。当经过（5）这一步骤，变“共同未知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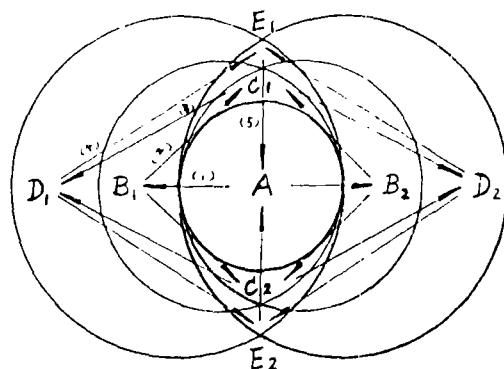


图 6 CEDAC 管理体系模式分析图

践”为“共同已知已践”时，一个新的循环便又开始了。

因果鱼骨图（CEDAC 图表）在图书馆管理工作中的应用还刚刚开始，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和提高。

**刘学丰** 笔名白丁，1982 年毕业于北大图书馆学函授班。现为中国农行长春管理干部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成人教育团工委主任。发表论文近 40 篇。通讯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8 号，邮编：130012。

（来稿时间：1992-02-24，编发者：翟凤岐）

#### （上接第 84 页）

定，辅以不同的取号方法。总之，真正科学的东西必然是来自实践，高于实践，指导实践。实践性不好的东西，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科学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书次号问题上也不例外。科学性和实用性是辩证的统一，不能割裂、对立和互为代替。一个真正好的号码表，一定是方法科学，结构合理，篇幅精炼，让人一看就懂，一学就会，虽有相当的重号率，但有简便的区分方法，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以上粗略的几点看法，未免不全面、不周到。不妥之处，乞望方家指正。

####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图书分类》编写组编著. 图书分类（修订版）.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 2 李严 同类书排列标准化问题. 中国图书馆学报，1991，17（4）：12~16
- 3 河南图书馆学刊. 1990（2），书次号专辑.

**茅振芳** 1962 年毕业于北大图书馆学系。现为宁波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发表论文近 30 篇。通讯地址：宁波大学图书馆，邮编：315211。

（来稿时间：1992-03-20，编发者：翟凤岐）

study, its concept of study and method of thinking should also adjust correspondingly. illus. 4 ref. 9

Library science—Statis quo

Subject research—Reviews

G250-1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Library and the Analysis of Library Problems / Lin Qingyun.—76~79**

Library undertakings in China have by no means got into the "low tide". On the contrary, they are developing and have been entering a new altitude. Still, there are difficulties and obstructions, which have mostly come from the "mother-in-laws" (i.e. the higher authorities). For the sak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ibrary undertakings, if only the "mother-in-laws" could manage well and be guardian angels. tables. 3 ref. 4

Library undertakings—China

Management of library undertakings—Statis quo

G259.2

**"Zhong Tu Fa"—the Revision Policy in Future and Problems Needing Attention / Song Anli.—80~82**

"Zhong Tu Fa" has been twice revised to a relatively wide extent since it came out in 1975. So far as the third edition is concerned, the class headings revised amount to 10442 which is the problem of, as the Chinese saying goes, "pulling one hair and the whole body is affected." The author holds that it is better for the future revision of it to adopt the system of consecutive revision and puts forward four problems needing attention, i.e. combining the "expert line" with the "mass line", maintaining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carrying out the principles of document guaranty, etc.

"Zhong Tu Fa"—Suggestions of revisions

Classifications—Principles of revisions

G254.122

**A Viewpoint Concerning Some Problems of Book Numbers / Mao Zhenfang.—83~84.88**

Problems of book numbers have repeatedly become a heated argument in the Chines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world.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function of book numbers is single, that i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a group of books with same classification numbers in order of priority.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re are duplicate numbers in the author table, ye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finding a simple and convenient metho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uplicate numbers. Stress should be laid on combining the scientific nature with the practical nature in preparing the author table.especially its operativity. ref. 3

Book numbers—Approaches

Author tables—Studies

G254.13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ause Effect Diagram with Addition of Cards to Library Management / Liu Xuefeng.—85~88**

The newly appeared Cause Effect Diagram with Addition of Cards (CEDAC Diagram) is an effectual method of management. by making use of it, one can analyse the quality of the library work, dissect each link in the working chain, and as a result, find out the optimum measures for improvement and correction. It pays a great attention to encouraging the staff to bring their subjective initiative into full play and jointly participate the library management. illus. 6

Library management—Theories

The Cause Effect Diagram with Addition of Cards(CEDAC Diagram)—Applications

G259.22

(译 刘译校)